

领导参考

Ling dao can kao

二〇一五年第一期 总7期

内部资料 注意保存

重点推介

- 01 以改革和创新培育中国经济新动力
- 05 全面依法治国抓住关键少数人

聚焦中三角

- 06 长江中游四省会呼公共服务“同城化”
- 06 武汉 GDP 破万亿中部之冠
- 07 九江：主动融入长江经济带
- 08 赣峡江水利枢纽造福老区

改革探索

- 09 习式改革具有示范效应
- 12 28省亮出国企改革方案
- 13 中国户籍改革的根本触及政治制度

经济广角

- 15 达沃斯克强时刻：首提“双引擎”概念
- 16 开局年“高开低走”从三地两会解析“一号工程”
- 17 新常态下经济政策调整坐标
- 18 中国经济新常态面临六大新机遇

三农问题 县域经济

- 20 产量与质量并重 中国农业将转换发展模式
- 21 今年中共中央一号文件颠覆了什么？

社会观察

- 25 中国需要改变思路提高城市生活质量
- 27 新城镇化亟待实现的三个转变

综合治理

- 30 “空气生死状”背后的中国式尴尬
- 32 经济下行 环境治理添压力

两岸四地 世界各地

- 33 基辛格谈中国崛起及世界局势
- 34 为何亚洲经济发展最具潜力亮点？

学术前沿

- 36 两会文化领域提案
- 38 专家学者论经济

孝感图书馆

以改革和创新培育中国经济新动力

张立 香港《经济导报》2015年1月26日

如果把每个国家的经济增长过程分为多个阶段，那么在不同阶段里，拉动经济增长的因素会很多，但总可以找到一个主要动因，如大量廉价劳动力、外商直接投资、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科技进步等众多因素其中之一。当今全球商业管理公认的竞争战略之父迈克尔·波特把国家之间竞争所推动的经济发展分为四个阶段，即生产要素驱动、投资驱动、创新驱动和富裕驱动。前三个阶段都是经济处于增长阶段，而富裕驱动则意味着国家已经走到经济衰退阶段。

按照他的观点，英国在19世纪前半叶已经跨入创新驱动阶段，美国、德国、瑞典则在20世纪初进入创新驱动阶段，日本、意大利是在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进入了创新驱动阶段，韩国则在21世纪初进入创新驱动阶段。一国处于创新驱动阶段的主要特征如下，依赖生产要素而形成竞争优势的企业越来越少；很多企业克服了生产成本或汇率变化的冲击；大规模海外投资潮的出现；产业集群向纵向深化或横向跨行业发展；政府无为而治等。

30多年来，中国GDP总值已跃居世界第二，而这期间的发展都依赖于资源的支持，这里对资源的定义属于广义范畴，包括原料、土地和劳动力等。尤其是中国的制造业，中国作为制造大国，以往依靠丰富的原材料资源、土地资源和低廉的劳动力成本，以一种粗放型的方式进行产业发展。而今中国希望由制造大国向制造强国转型升级，低成本优势已逐渐丧失，今后该何去何从？

近年来，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几乎已成为全社会共识，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路径比较官方的提法是靠创新驱动，创新驱动几乎也成为从政界到学术界以及经济领域的日常用语。

2014年从深改组会议到国务院常务会议，创新驱动战略一直贯穿始终，以科研项目和资金管理、科技成果使用处置和收益等方面的改革正在展开。虽然科技体制改革不会马上带来促进增长的成效，但效果会在更长远的未来释放出来。2015年科技领域的改革还会加速，可能会有进一步的促进创新驱动的政策出台。

让经济增长有创新驱动

中国经济正在发生阶段性变化，这种变化从表征上看，似乎是经济增速在减缓，但本质上是经济结构重构和发展动力重塑的过程。中国宏观经济学会常务理事王一鸣指出，中国经济新的力量正在形成，目前正处在旧的力量和新的力量交替更迭的阶

段。随着产业规模扩张的空间逐步缩小，向中高端水平发展已势在必行。未来经济发展要从过去以铺摊子为主转向上台阶为主，产业升级要上台阶，创新也要上台阶。以前以信息网络、新能源、生物、纳米等技术群体性突破和广泛应用为标志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风起云涌。一是信息技术现在进入新一波的创新浪潮，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和3D打印等新一代信息技术不断涌现，推动信息产业升级换代；二是新能源技术取得重大突破，目前新能源占全球能源消费的比重已达14%左右；三是生物技术进入产业化阶段，尤其是基因测序技术的发展正在改变传统的医疗模式；四是新材料技术和先进制造技术取得重大突破，最重要的是机器人技术的突破。目前智能工业机器人的价格平均为每台10万至15万美元，预计到2025年将下降50%，并广泛应用于工业制造、康复医疗、国防军工等领域，现在国际上最前沿的科学家正在开发具有逻辑思辨力的智能机器人，未来机器人产业将有很大发展空间。

王一鸣认为，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与中国产业转型升级形成历史性交汇，对中国加快推进创新上台阶，以创新推动产业向中高端水平迈进提出了以下新要求。

一是推进市场导向的科技创新。要强化企业在技术创新中的主体地位，建立企业主导产业技术研发创新的体制机制，鼓励科技要素向企业流动，引导资金、人才和技术等创新资源向企业集聚，支持企业加强研发平台建设，特别是要加大对中小微企业技术创新扶持力度。

二是把培育新兴产业与科技创新结合起来，如果战略性新兴产业也做成加工组装模式，搞产能扩张，这就没有意义。培育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一定要与研发和创新有机结合起来，要掌握核心技术。

三是强化创新驱动的教育和人才基础，加快改善高校、科研院所向企业技术转移机制，积极探索创新人才的培养和激励机制，强化创新驱动的教育和人才基础。

四是构建创新驱动发展的动力机制。加快生产要素和资源性产品市场化改革，增强企业创新发展的动力。深入实施知识产权战略，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和执行力度。

五是推动科技和经济的紧密结合。在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电动汽车等新兴领域组建一批新型研发机构，取得一批原创性科研成果。建立有利于创新潜能充分发挥的体制环境，促进创新资源高效配置和综合集成，使全社会创新潜能充分迸发出来。

创新驱动的三大困境

改革开放伊始，中国主要依靠引进国外现代科技成果或先进设备来提升国家生产力的科技水平。这种情况在进入新世纪后，特别是进入十二五规划时期后，已经有了根本的改变。一方面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和大力引进国外先进科技，中国与国外在科技水平上的差距已经迅速缩小；另一方面随着经济发展，中国自身的科技力量也得

到了一定的积累，自身逐步具备了在科技创新活动投入人财物资源的能力。

目前全国每年投入研究开发的经费已经超过万亿，所拥有的科技人员数量在全球各国中也已经名列前茅，整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形态正从要素与投资驱动型向创新驱动型转变。但与此同时，也要看到在中国实行创新驱动的过程中还存在种种问题。

中国研究机构去年底发布《国家创新蓝皮书：中国创新发展报告（2014）》支出，创新发展支撑不力、企业创新能力不足、高端创新人才缺乏是制约中国创新的三大困境，为此中国应加强科技前沿和基础研究，加强企业自主创新能力，进一步开展开放与协同创新。

一是创新能力和创新对经济发展的创新作用仍显不足，一些主导企业对生产要素驱动的路径依赖严重，艰难地探索从中国制造到中国创造的战略转型路径，在科技创新能力提升过程中还缺乏重大突破性科技创新成果。

二是企业创新体系和能力建设的路径规划还不清晰、受重视程度尚不足，目前中国企业创新能力亟待提升。除部分创新型企业之外，中国其他企业创新投入的资源基础薄弱，包容创新失败的空间有限，对关键核心技术研发投入的信心不足。

三是虽然中国的科技人力资源总量居世界第一，但是人均产出效率远落后于发达国家，高端的创新型人才仍非常稀缺。2012年中国劳动人口平均GDP（总GDP除以总的就业人口）为每人15868美元，居世界第57位，在世界经济论坛（WEF）发布的《2013年全国竞争力报告》中，中国劳动力效率排在第34名，高等教育的质量并排在第70名。

据分析，要破解中国当前遇到的创新困境，关键在于加强科技前沿和基础研究，加强企业自主创新能力，进一步开展开放与协同创新。其中，自主引领、开放协同应是国家创新战略的核心，必须打破创新资源封闭割裂发展的困局，鼓励国家创新系统中不同主体间协同，提高创新资源的集成综合利用效率，加快实现国家创新能力的全面提升和重点领域的突破。

把体制创新作为切入口

除上述三个困境，目前在中国的科技创新活动中还存在着的一些其它问题。例如科技活动与经济发展存在两张皮，大学与科研单位行政化严重，企业创新动力不足以及科技活动中存在大量造假腐败等现象还没有解决，这些问题不能解决的根源就在于创新活动的体制机制还存在较严重的不合理不完善问题。因此，对创新的体制机制的改革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如此迫切。

面对内需不足、资源瓶颈、能耗过大等经济转型的困难，我们看到更多的口号是创新驱动，而创新的主导又是政府，各地方政府都在设计创新规划、创新考核目标。而创新的主体是企业家，创新是生产过程中内生的，是新工具或新方法的应用。

因此实现创新驱动发展，首先建立起崭新的企业制度，并以科技创新、产业模式

创新、产品创新等方面为落脚点，应用前沿的实践创新方法与工具，逐步实现转型升级。要形成好的体制机制，企业经营者的创新意识对推动企业发展至关重要。企业创新乏力，这是当前中国企业普遍存在的问题。国企占据优势地位，没有非创新不可的紧迫感，而民营企业又确实缺乏创新的条件。要想鼓励创新，依靠创新驱动发展，需要跨过体制障碍。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孙立坚支出，现在很多的资源集中在国企和央企身上，这也是中国目前的产业结构所决定的，而在一个垄断的结构当中，由政府的财力扶持，它的创新更多会出现形式主义，这个成果的竞争力也不一定强，现在关键的问题首先还是要把创新引入到企业自身发展的内在动力，让竞争倒逼我们的企业创新，像欧洲很多的企业因为结构规模比较小，中小企业为了生存，完全是以客户导向去跟进市场，去发现每一个客户的需求，甚至每一个客户自身的这种需求也带来了新的工作岗位。美国是通过金融创新来做一些原创的东西，原创的东西风险很高，成功的效率可能只有12%、20%，但是金融创新服务到位的话，可以分散风险。不管怎么样的创新，国家都做好知识产权的保护，引导人才，扶持中小企业加入到创新的大军当中来，这是未来政府应该花大力气做的事情。

2014夏季达沃斯论坛的主题是“推动创新创造价值”，李克强总理将创新的定义为从技术创新扩展到机制创新，明确表示中国过去的改革历程就是一场宏大创新，未来发展的巨大潜能仍蕴藏在制度变革之中。如果将改革定义为创新一种，那么技术创新更多是微观层面，而改革就是政府层面的穿心，而这种创新在李克强讲话中，最关键的是政府的自我革命。

如果说创新是中国发展的新引擎，改革就是必不可少的点火器。北京大学副校长刘伟指出结构升级是一个结果，它的推动力是制度创新，而改革是中国目前最根本的制度创新。

全面依法治国抓住关键少数人

香港《太阳报》2015年2月8日

每年在中央党校举办的省部级主要干部专题研讨班，是观察政府政治动向的一个重要窗口。今年研讨班的内容是学习贯彻十八届四中全会精神，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虽然内容并不新鲜，但习近平的开班讲话则在四中全会的决定上有进一步的拓展，其中一些新提法尤其引人注目，如全面依法治国必须抓住领导干部这个关键少数，就包

含了丰富的含义。

简单地说，关键少数就是各级领导干部，尤其是党政一把手。而在这些人中，各省和中央各部委的党政一把手又是关键之关键。换言之，到中央党校参加专题研讨班的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是全面依法治国必须抓住的关键少数。这部分领导干部大概有400人至500人，其中又分两部分，一部分是封疆大吏，另一部分是朝中大臣，在中国的政治结构中，欠着在最高层和中间起着上传下达作用，后者处于政策枢纽地位，都是关键角色。中央只要把这几百人即关键人数抓好了，再由他们去抓好下一层级的关键少数，使他们成为治国理政的法治模范，那么全面依法治国就会见到成效。

由此看来，今年依法治国的重点会是这些关键少数。这个法治思路可谓真正抓住了依法治国的牛鼻子。中国的政治传统讲究上行下效，强调领导干部治国先要修身，以身作则和率先垂范的重要性。而且领导干部有权力、有资源去推进法治，因此法治信仰能否深入人心和外化于行，关键取决于领导干部特别是这些关键少数能否带头遵守法律，涵养宪法法律至上、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权由法定和权依法使的法治观念，形成用法治思维谋划工作和以法治方式处理问题的工作方式。

从现实来看，与全面依法治国的要求相比，很多领导干部包括被视为关键少数的主要领导干部，由于对权力缺乏足够自觉、法制观念淡薄和特权思想严重，以言代法、以权压法和徇私枉法的现象很普遍。他们往往把个人等同于组织，把法律当作治民的工具，把党的领导作为违法的挡箭牌，用批示、条子、电话和打招呼作为行政手段。这无疑会严重损害人民群众的利益，影响和败坏执政党的形象和威信。如果不把这些现象和行为纠正过来，用法律去约束权力，使领导干部必须带头自觉遵守法律，只能在法律之内，而不能在法律之外，更不能在法律之上执政和行政，否则就不可能以上带下，带动全社会落实法治、依法治国。

今年是依法治国的全面推进和落实之年，关键少数的提出，意味着政府开始摸到了依法治国的脉搏，从而在中国形成运用法治监督领导干部用权的新常态。

聚集中三角

长江中游四省会吁公共服务“同城化”

张玲杰 香港《文汇报》2015年2月8日

长江中游城市群省会城市第三届会商会（简称会商会）昨日在安徽合肥举行。武汉、长沙、南昌和合肥四个省会城市共同签署《长江中游城市群省会城市第三届会商会合肥纲要》（简称《合肥纲要》），将在六方面进行深化合作，致力于公共服务

“同城化”。

根据《合肥纲要》，四个省会市将深化包括完善市场一体化机制、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建立环境保护联防联控机制、深化产业合作、社会公共服务共享、文明城市共建等方面的合作，同时还将在搭建开放型经济合作平台、加强区域信用合作、建立住房公积金异地使用合作机制、建立金融市场互通体系等方面展开合作。

在加快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建设和推进基础设施平台互通建设方面，包括加快共同推进国家启动上海-南京-合肥-武汉-成都沿江高速铁路、加快汉江、湘江、赣江和巢湖等流域航道整治等铁路、航运和空港在内的交通互联互通。

与此同时，四省会城市还将在建立环境保护联防联控机制、深化产业合作、社会公共服务共享、文明城市共建等方面达成共识，共同促进长江中游城市群发展等方面达成合作。长沙市委书记易炼红表示，四省会城市通力合作，共同发展，将有助于形成合力，共同争取国家政策支持，促进加快长江中游城市群发展的相关政策早日出台。

武汉GDP破万亿中部之冠

香港《大公报》2015年2月4日

继2013年地区生产总值突破9000亿元（人民币，下同）、重返中国城市经济十强后，2014年武汉市GDP总量突破万亿元，成为中部首个跻身“万亿俱乐部”的城市。

据中新社报道，在3日召开的武汉市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上，武汉市代市长万勇在政府工作报告中透露这一消息。

“提前一年完成‘破万亿’目标，离不开当地工业的强大支撑。”万勇在政府报告中介绍，2014年随着上海通用武汉生产基地一期、北车轨道交通装备修造基地、周大福珠宝文化产业园等5个投资50亿元以上工业项目建成投产，预计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达11764.6亿元，增长12.3%。

作为武汉第一大支柱产业的汽车产业在2014年继续为当地经济发力，汽车产销量均突破百万辆。其中，集中东风本田、东风雷诺等众多国际品牌的“中国车都”武汉开发区当年汽车及零部件产业产值首次突破2000亿元大关。

与此同时，文化创意、商贸物流、电子商务等现代服务业规模大幅提高，战略性新兴产业规模的不断壮大，为该市经济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

“牢牢扭住工业这个牛鼻子，敢于跳起来摘桃子，确保实实在在的增长。”万勇表示，今年武汉还将谋划推进“工业倍增升级版”，加快100项工业重大项目建设，工业投资突破3000亿元，同时大力发展研发、创意设计、电子商务、互联网金融、信息

服务等新业态，2015年计划地区生产总值增长10%左右。

据悉，在刚刚结束的湖北“两会”上，武汉市委书记阮成发透露该市“万亿倍增”的新目标，提出用7年左右时间，实现经济总量由1万亿向2万亿跨越。GDP过万亿元，是一座城市发展的重要里程碑。此前中国城市“万亿俱乐部”成员分别有上海、北京、广州、深圳、天津、苏州、重庆、成都。

九江：主动融入长江经济带

周伟凤《香港商报》2014年2月5日

江西作为长江之“腰”和中部区域发展的重要一极，如何融入长江经济带建设，成为今年参加江西“两会”的代表和委员关注的焦点。据了解，作为江西唯一的港口城市、长江中游的关键节点和重要支点，九江正通过对内“全力做大九江”、对外加强区域合作，主动融入长江经济带建设。

决战工业一万亿带动经济“独好”

江西省人大代表、九江市委书记殷美根表示，长江经济带战略的实施，给九江带来深度开放、先行先试、立体交通、产业升级、发展提速“五大新机遇”。在做大经济总量方面，九江以工业为突破口，提出了“决战工业一万亿(即到2017年规模以上工业主营业务收入达到1万亿元以上)”的目标，带动全市发展提速、势头强劲。

2014年，九江经济发展逆势上扬，呈现“风景这边独好”的景象，其中，GDP、财政总收入、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规模以上工业主营业务收入、实际利用外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等7项经济指标增幅位列江西省第一。外贸出口突破45亿美元，工业固定资产投资突破1000亿元，达到1249亿元。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突破1000户，达到1121户，总数跃居全省第一。

旅游经济加速升级，各项指标继续保持全省第一。旅游总接待游客突破7000万人次，旅游总收623亿元。县域实力加速壮大，县级财政全部突破10亿元、6个突破20亿元。所有园区主营业务收入过100亿元，8个过200亿元，九江经济技术开发区突破1000亿元。九江港口货物吞吐量突破8000万吨，集装箱吞吐量22万标箱。

推赣鄂皖沿江经济协作区

九江市地处百里鄱湖、千里京九、万里长江的交汇点，又处于赣、鄂、湘、皖四省交会。有委员建议，如果能打破行政区划发展的制约，实现跨江跨区的合作，将有利于长江中游城市群之间的合作，从而更好地提升长江经济带的整体发展水平。

殷美根表示，九江要在开放升级与区域合作上构筑新格局。一方面，在推进沿江开放开发、共青先导区建设与昌九一体发展的基础上，主动谋划“昌九新区”建设，

抱团参与长江中游城市群竞争。目前九江与省会城市南昌两地的“同城效应”逐步显现。

另一方面，为加强沿江城市之间的互联互通，九江正在积极谋划“赣鄂皖沿江经济协作区”建设，推进沿江地区与宿松、望江、黄梅、武穴等地联动发展，通过协作区，共建大平台，争取大政策，实施大协作，率先在长江经济带中部薄弱环节，主导区域合作，增强自身实力。

殷美根介绍，九江还将在现有长江大桥、长江二桥的基础上，积极推进和谋划10条新的过江通道，争取新增过江通道占全国总数的1/8。

赣峡江水利枢纽造福老区

黄颖、郭美勤《香港商报》2015年2月25日

被誉为江西“小三峡”的峡江水利枢纽，位于吉安市峡江县境内赣江中游河段，是国家“十一五”水利规划内的大型水库工程，也是目前江西省投资最大的水利枢纽工程。

该工程在建设中，创造了全国面积最大的“抬田”工程，使项目区群众成为峡江工程建设的受益者，同时带来了无法用金钱来衡量的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

优质工程精益求精

2009年9月，吉安峡江古镇巴邱，峡江水利枢纽工程开工奠基，截至2014年10月底，主体土建工程基本完成，目前已有6台机组安装完成投运发电。

据了解，该工程是兼具防洪、发电、航运、灌溉等综合利用的水利枢纽工程，总投资99.22亿元。

工程建成后，南昌市的防洪标准可由100年一遇提高到200年一遇，赣东大堤防洪标准可由50年一遇提高到100年一遇。

工程建设多项数据刷新了江西水利建设史上新纪录；建设全部按设计节点目标完成进度，在全国大型水利工程建设中并不多见，受到了水利部领导的高度肯定；首台正式交接的机组，最大外径9.36米，转轮直径7.8米，为亚洲第一、世界第二大灯泡贯流式机组。

抬田移民水顺民安

水利枢纽工程兴建的重点和难点是移民。整个工程涉及吉安市的吉水、峡江、吉安、吉州、青原5个县(区)、18个乡镇、73个行政村，涉及的庞大而艰巨的移民搬迁安置工作任务在全省水利史上都是前所未有的。江西水利部门通过实施防护工程和抬田工程等措施，把淹没耕地面积和搬迁人口降到了2.9万亩和2.4万人。这其中，“抬

田”起到了关键作用。

峡江水利枢纽抬田工程主要是将水库浅淹没区域的耕地高程抬高至高于水库正常蓄水位0.5至1米，并对抬高后的耕地配套田间工程，完善农田灌排条件，使被抬高后的耕地满足农业生产要求。峡江水利枢纽“抬田”工程面积共3.75万亩，如此大面积、集中连片实施抬田工程，为国内同类水利工程首创。经过3年左右的耕作，农田水稻产量已恢复到了抬田前水平，一些农田粮食产量甚至高于抬田前水平。

工程移民安置工作始终在稳步推进着，目前共新建移民新村117个、累计完成了征地4.99万亩，完成了库区2.5万人移民搬迁安置及库区内的征地拆迁、专项设施迁改建等淹没处理。

改革探索

习式改革具有示范效应

文扬 新加坡《联合早报》2015年2月5日

习近平执政两年，最显著的成就是大力推动了中国的改革，并且不是如很多人士期望的那种越来越接近西方模式的改革，而是按照“不犯颠覆性错误”、“不走老路，不走邪路”、“坚持党的领导”这种既定原则进行的自主性改革，也是逐步落实十八大各项改革承诺的闯关式的改革。

为区别于中国“自由派”心目中处处以西方为标准的“西化改革”，不妨称之为“习式改革”。

“习式改革”力度之大，效率之高，令人瞠目。仅简政放权方面，2013年国务院取消和下放行政审批事项416项，2014年317项，两年合计733项，已提前完成了李克强当初许诺的本届政府削减三分之一审批事项的任务目标。

而反腐方面，十八大以来，共有超过18万人被处分，“一天三人落马”的反腐节奏已成常态，包括四个“副国级”在内的省部级以上高官40多人被查处，是十八大以前的数倍。

其他还有包括了户籍制度、土地制度、社保制度、金融体制、财政体制等重大领域在内的经济和社会多方面改革，短短两年里，都有了决定性的甚至是历史性的突破。

自主改革才是硬道理

英国《金融时报》日前有评论文章称：“我们很难再想到还有哪位世界重要领导人的政府，在如此短的时间内达成了如此多项成就。习近平当然可以因许多议题遭受

批评，但未能兑现改革诺言并不在其中。”

环顾当今世界，各国都在改革，尤其是近年来深陷债务危机、金融危机和经济停滞泥潭的西方各国，从美国到英国，从法国、意大利到日本，其政治领导人也无一不在大力呼吁改革、推动改革。但可以说，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够像当今中国这样，以一种说到做到、只争朝夕的方式全面推进改革进程。如果有一个世界通行的“改革进度指标”，类似国内生产总值（GDP），那么中国近两年在这方面的表现一定比中国的GDP还更加“一枝独秀”，甚至是“一骑绝尘”。

习近平在2015年的元旦致辞中说：“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要团结一心，集思广益用好机遇，众志成城应对挑战，立行立改破解难题，奋发有为进行创新，让国家发展和人民生活一年比一年好。”

在今天的中国，“让国家发展和人民生活一年比一年好”这一愿望的可实现性，几乎不受任何怀疑。而放眼四海，任何一个国家如果全国人民团结一心，并且能够“集思广益用好机遇，众志成城应对挑战，立行立改破解难题，奋发有为进行创新”，还有他求么？无论在欧洲、美洲，还是非洲、大洋洲，这不就是一个成功的国家、光明的国家、大有希望的国家了么？还用得着迁就其他什么标准么？

这又回到了关于自由民主的陈词滥调中。不用说，自由、民主、法治、人权、平等、公正，都是极美好的标准，但再美好也属于人工造物，也一样难逃日久弊生、物极必反的铁律。西方各国的经验已经表明，自由一旦绝对化，政治早晚被资本所绑架；民主一旦绝对化，政府早晚被庸众所劫持；同样道理，人权也好、法治也好、平等也好、公正也好，一旦绝对化、天天被高调宣扬、成了空想乌托邦，也就必然成为政治的桎梏、政府的枷锁，导致政治失去自主的行动能力，最终发生整体的衰败。

“习式改革”是现成的实践案例

对于这一点，西方一些有识之士也已经认识到了，关于自由和民主的变质、平等和法治的困境，以及政治的衰败，都有了较深入的讨论。而中国当前的“习式改革”，恰好为他们的理论研究提供了一个现成的实践案例。

其实谁都明白，中国并没有发现真理。中国之所以做对了，无非是凭经验和常识避开了一些明显的谬误。从三十多年前开始，中国坚定地踏上了改革前行的道路，改革优先、改革挂帅，一切不利于改革、有碍于改革的东西都要让路。

从这个起点出发，西方式的自由民主，实际上是被当作改革的障碍物、误区甚至陷阱，而被拒之门外的。因为政治的决断和自主、政府的威权和强势，都是改革得以强力推进的必要条件，在攻关克难的关键阶段，既不能被资本所绑架，也不能受到民粹的干扰。这就是一个很简单的常识逻辑，只要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谁都能发现。

反观西方，实际上是干了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的蠢事。当初西方的崛起和全球统

治的建立，当然不是靠观念先行，更不是自由民主乌托邦蓝图的产物。但是后来为了抢占道义高地，为其全球统治提供合法性基础，甚至为其帝国主义行径提供辩护，不得不将自由民主拉到绝对化的高度上，成了某种脱离实际的先验原则。

结果，在国际上，虽然在意识形态软战上有效打击了非西方国家，特别是社会主义国家，但同时也因为不得不实行双重标准，制造了极大的混乱；而在国内，则差不多是杀敌一千自损八百，因为长期以来在人权、法治、平等、公正等标准上过于高调，导致了理想和现实的冲突无法调和，体现在少数民族和弱势群体的骚乱抗争持续不断。

最严重的问题还是政治，由于受到来自经济和社会各方面的多重压迫，政治自主性完全丧失，改革也就只能流于空谈。表面上是在回应所有方面的诉求，实际结果却是什么也回应不了。

相比之下，由于排除了各种掣肘，中国的政治，几乎可以游刃有余地回应国家发展和人民生活各方面的要求。2015年的中国，由于提前两三年就完成了政府的简政放权，经济力和社会力进一步释放，中央政府的政治力也更加集中，“习式改革”有望在一种更加活泼、开放的局面中展开。

即使面前难题如山，只要改革在大步前行，高速前行，就一定胜利在望。

这就是中国特色的、以政治自主性为保障的全面深化改革。若从这个角度进行横向比较，“习式改革”对于整个世界都有正面的示范效应。（作者是香港中国力研究中心副主任）

28省亮出国企改革方案

章蓓兰 香港《文汇报》2015年2月5日

备受关注的国企改革在今年迈入关键年，已有28个省份在地方两会上亮出改革路径，其中，“混合所有制”、“整体上市”、“兼并重组”、“国有资本投资公司试点”等成为出现频率最高的国企改革关键词。另有消息透露，国企改革顶层设计亦在紧锣密鼓进行当中，多达近十项国企改革方案有望春节前出台。这场超过万亿元人民币资金的资产改革盛宴，将为中国经济发展注入新的原动力。

上海首先实施

国企重镇上海于2013年年末率先打响地方国企改革的“第一枪”，在优化国资布局、任期制契约化管理、支持企业科技创新、探索上市公司员工持股等方面取得颇多进展。上海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到，将继续深化国资国企改革，加快开放性市场化重组，稳步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上海市国资委主任徐逸波在上海两会上明确指

出，上海发展混合所有制的主要实现形式就是发展公众公司，推动集团公司的整体上市和核心资产上市。他还透露，国资流动平台在正式运作以前，首先要建立一个公开透明规范的运作制度，然后分步骤把有关的国有股权注入到两个平台，在此基础上再选择适当的时机，进行国资流动项目的实质性运作。有消息指，上海国有资产流动平台很可能于本周正式启动，首批国有企业划转名单也将在启动仪式上公布。

各省因地制宜

其他省市也因地制宜，指明国企改革路线图。除了吉林、海南、广东三省外，迄今已公布今年政府工作报告的28个省份均明确了改革重点。例如：重庆欲推动市属国有集团层面混合所有制改革，推进国有资本运营公司和投资公司试点；安徽将推动具备条件的省属企业兼并重组、整体上市。

不少省份在部署改革工作时还明确了具体领域。浙江要以港口、交通等投资营运平台建设为突破口，推进国有企业、国有资产整合重组；陕西决定将文化企业作为抓手，特别提及要推动文化企业加快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北京则要将国有资本更多集中到公共服务、基础设施建设、生态环境保护以及战略性新兴产业等领域。另有省份更进一步，改革措施剑指具体企业，甘肃强调今年要扎实推进酒钢等5户企业改革试点，江西要重点抓好江铜、新钢、省盐业集团等改革试点。

更为关键的是，国企改革顶层设计方案据称也已呼之欲出。据透露，顶层设计将以“1+N”的形式呈现，即一个国企深化改革的总体指导意见和三四十个相关改革配套文件。此前，《中国证券报》曾援引国务院国资委研究中心副主任彭建国指，关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指导意见、及八九个相关配套文件已趋成熟，将争取在春节前推出。彭建国并表示，一些方案已报到国务院改革办，讨论通过后将报由中央深改办讨论，方案大部分都已达成共识，不存在太大争议。

中国户籍改革的根本触及政治制度

新加坡《联合早报》中文网 2015年2月17日

举步维艰的中国户籍制度改革裹在一份中国官方公布的“公安改革方案”中，迈出了一小步。2月1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审议通过公布了《关于全面深化公安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框架意见》。《意见》的其中一条是将在中国城市中全面取消“居住证”制度，逐步以“居住证”取代。

以永久性的居住证取代居住证，能给数以亿计流入城市的农民工带来实际利益和方便，比如子女教育、购房买车等。支持者说，这标志着中国实行了半个多世纪的“农业”和“非农业”二元户籍管理模式向最终退出历史舞台迈进了一步。批评者则

认为，解铃还须系铃人，中国户籍制度的改革根本是中国政治制度的改革和社会转型。

身份的背书 生活的“入场券”

1958年1月9日，经全国人大常委会讨论通过，中国颁布了第一部户籍制度《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从此逐步确立了一套世界上最严格的人口移动控制制度。

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大批农民进城打工，他们及其子女的身份、权益、保障受到户籍制度的严重束缚和侵蚀。户籍制度引起愈来愈广泛的争议与指责。全国人大常委会辜胜阻在人民网强国论坛上承认，城乡户籍的差异存在超过60种的社会福利。

一个“城市户口”的含金量有多大？

中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社会发展研究部的一份课题报告称，目前与户籍挂钩的个人权利有20多项，涉及就业、教育、社会保障、计划生育等各个方面。城市户口附着太多有形或无形的福利，甚至是尊严和身份的象征。像北京上海这样的大城市，户口实际上成了生活的“入场券”。

户籍制度改革，则是雷声大雨点小，依然处于“务虚”状态。户籍就像挡在中国农村和城市间的一扇铁门：门外的人要推门而入，而门里的人却牢牢地攥住门把手。

户籍改革的症结

但是，北京理工大学人文学院教授胡星斗在接受BBC中文网采访时说，第一次以官方文件的形式宣布彻底取消“暂住证”，至少是向前迈出了一步。胡星斗教授认为，以居住证代替暂住证，涉及到市场经济对人力资源的配置、公民社会对公民权益的保护，从这个方面看它的意义还是重大的，因此推动起来也是非常困难的。

胡星斗教授分析说，中国的户籍制度实际上是计划经济的产物、是管控社会，或“说得更难听一点”，是专制社会的产物。一个现代社会中是没有“二元户籍制度”的。随着中国超着现代社会、法制社会的前进，户籍制度改革无法回避。

胡星斗教授认为，中国户籍制度改革的“拦路虎”，一是旧的观念。一些官员仍然认为，二元户籍制度是实现中国社会稳定的基石。认为必须通过户籍制度将中国城乡分割开来，将中国各地区分割开来才能有效管控。二是既得利益。如果农村人获得与城市人一样的权益，将会侵犯从个人到政府部门广泛的既得利益。

中国官方在宣布取消“暂住证”的同时又说，北京等少数几个农民工流入量最大的城市不在此列，农民进北京城打工仍需申请办理“暂住证”。

中国国家发改委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主任李铁对媒体表示，一次性将外来人口全部改成城市户籍人口，不仅对地方财政形成较大压力，也将会出现人口倒挂情况。在他看来，像北京上海这样的大城市根本没有办法进行户籍制度改革，因为它们

集中了中国全国最好的资源，福利与发达国家接近。要解决户籍，同时要解决含在户籍上的公共福利，意味着政府的支出一定会向这方面倾斜，会使原来的居民福利受到很大的影响。

“钱袋子”与“权把子”

对此，北京理工大学现代中国问题专家胡星斗教授很不以为然。胡星斗教授认为，“财政上承受不了”实际上只是一个借口而已。胡星斗教授说，即便是把1.6亿左右出外打工的农民工都城市化，按中国有关部门的花费测算，也就是一二千亿人民币，这笔钱中国是完全能拿得出来的。之所以“拿不出来”，关键是中国的财政支出是由官员掌控的，而不是像发达国家里由议会、也就是选举议员的老百姓掌控的。

“钱袋子”掌握在各级官员手里，户籍改革侵犯他们的利益，他们当然不干。

胡星斗教授说，中国的户籍改革意味着中国的财政制度必须转型。而建立现代财政制度说到底又与政治制度有关。中国的人大必须要能掌握“钱袋子”、人大代表必须能代表人民，这的确又涉及到政治改革。

经济广角

达沃斯克强时刻：首提“双引擎”概念

香港《成报》2015年1月27日

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出席达沃斯论坛时首提“双引擎”概念，即激活中小企业和私人部门的增长引擎，以替代房地产和传统制造业留下的空缺。并对传统引擎进行改造，其重点是扩大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攻击，补齐“短板”。“双引擎”助推“双中高”发展，成为中国未来经济增长点。

李克强表示，目前中国的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服务系统还有很大的空间。据统计，现今中国公共设施的存量仅为西欧国家的38%，北美国家的23%，服务业水平比同等发展中国家还要低10个百分点，而城镇化则比发达国家低20多个百分点。而这也正是中国经济未来的增长点。

造经济新增长点

李克强特别强调启动“双引擎”，推动中国经济“双中高”发展——持续实现中高速增长，整体经济结构达到中高端水平。“双引擎”中的第一引擎便是打造中国经济新引擎，敢于对传统思维“说不”，为创新体制“较好”下决心推进结构性改革。

自2014年以来，李克强总理反覆强调“大众创新，万众创新”，力图通过诸如推进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等方式，为创业松绑，激活中小企业和私人部门的增长引擎，以替代房地产和传统制造业留下的空缺。而另一引擎则是改造传统引擎，其重点是扩大

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攻击，补齐“短板”。

长期着眼中高速增长

李克强承认2015年中国经济仍面临较大下行压力，但是中国不会发生区域性、系统性的金融风险，中国经济也不会硬着陆。而在是追求短期更高增长，还是着眼长期中高速增长的问题上，答案只能是后者。李克强承诺保持战略定力，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不会搞大水漫灌，确保经济运行在合理的区间，同时着力提升经济的质量和效率。

在新常态下，中国“列车”不会调档失速。李克强总理强调，中国不应再一味追求速度，而应纾缓当前绷紧的供求关系，为已重荷的资源环境减负，腾出手来推进结构性改革，向形态更高级、分工更复杂、结构更合理的发展阶段演进。只有这样，中国经济的列车不仅不会掉档失速，反而会跑得更稳健有力，带来新机遇，形成新动能。

开局年“高开低走” 从三地两会解析“一号工程”

海岩 香港《文汇报》2015年1月29日

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被外界称为总书记习近平上任后亲自推动的“一号工程”。下月“一号工程”届满周年，外界评价开局年“高开低走”，顶层协调机构组建，三地高层互动频繁，但千呼万唤的总体规划一再难产，京津冀增长及将来的模样，至今没人说得清。

日前京津冀三地陆续召开两会，“京津冀协同发展”均被写入政府工作报告并被热议。细心观察发现，在谈及京津冀协同发展时，三地风格迥异，北京高调，河北低调，天津淡定，与以往有大不同，个中深意值得玩味。

此次，北京尽显“带头大哥”锋芒。呼应习总书记的号令，今年北京不仅把“积极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作为首要任务，还提出“主动担当、主动作为”，地方首脑则频频高调表态：“牺牲局部利益在所不惜”、“津冀好了，北京自然会好”，大有蓄势待发之意。

北京的高调与以往大有不同。京津两大直辖市拥有政治和经济资源，过去对于京津冀一体化，历来是河北积极，京津冷淡。而今，北京态度大转变，背后还是政绩压力。过去发展是政绩，现在中央最看重的指标恐怕是“宜居”。北京市长王安顺说，北京确实不宜居，这或许正是习总书记的告诫。看今年北京市政府工作报告，“减、迁、疏、控、禁……”是关键词，削减经济资源“瘦身”成主旋律，这在以前做大做强的政绩考核体系中很难出现。

今年河北低调许多，大概是吸取了去年太高调的教训。去年3月最先从河北传出保定做政治副中心的消息引爆京津冀一体化的热潮，但同时招来怀疑和反对，一度导致规划搁浅，如今虽然“京津保中心区”的地位确立，但政治副中心的说法再无下文。在此轮京津冀协同发展中，河北实际是最大的受益者，是产业、资金的承接者和流入地，是生态补偿制度的受益方，其实无需多言，埋头“吃饭”就好了。

天津则表现出与京冀完全不同的淡定。从目前披露的天津市政府工作报告内容看，天津是三地中唯一没有将“推进京津协调发展”单列工作任务进行专门部署的省市，而且相关论述聚焦在创新合作。仔细想来，天津的这份淡定，或许来自于不久前获批的天津自贸区。在京津冀协同发展背景下获批的天津自贸区，令天津在三地一体化中独占优势，自贸区在那里，自然不会发愁没有企业、资金到那里。

从三地两会透露信息看，“一号工程”的走向基本明朗。“京津冀保中心区”的架构确立，保定的区域地位势必提升。北京的非核心产业和功能转移要加速，据知中央留给北京“壮士断腕”时间可能只有三年。

从产业承接看，三地规划仍有分歧。北京制造业外迁倾向河北曹妃甸，创新合作则意属天津滨海。而河北，则在曹妃甸、廊坊、涉县及新机场临空区备好四只“碗”，等待京津制造业外迁的“米”到“碗”里来；科技创新合作平台则有意建在白洋淀、秦皇岛、固安和邯郸。天津则有意在滨海、宝坻打造创新平台。

此外，一些民众呼声高的民生措施有望加速落地，如区域交通一卡通、医保互通等，京冀已医保互通、双向转诊、检查互认等便民措施达成一定共识。

新常态下经济政策调整坐标

香港《大公报》2015年2月25日

羊年春节，位于北京中关村的中国最著名的电子卖场群门庭冷清，然而，在北京西四环外多家快递公司的快递堆积成山。这一景象诠释了“新常态”这一当下中国宏观经济领域最为热门词汇的内涵：传统的优势逐步消退，新的动力开始聚集。而新旧转换阶段最直观的特点正是各种指标的冷热不一。

即便是从更为宏观的视角来看，这种分化的特点也依然明显。在工业领域，2014年，中国工业企业利润增速大幅回落至3.3%，但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增速却高达15.5%。

“在中国经济结构调整，增长动力转换的新阶段，分化是很正常的现象。”中国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盛来运表示，一些分析人士如果没有注意到这一特点，还是依靠单一指标来分析中国经济，就会陷入判断的迷雾。

在中国经济系列核心指标中，最受关注的依然还是GDP增速。刚刚过去的2014年，

中国GDP增7.4%，创出近24年来新低。国家统计局局长马建堂在数据发布会上专门向媒体建议，在新常态下，不要只关注GDP多少年新低，而应同时关注就业、物价等多个指标。

调结构打造新经济点

事实上，淡化各方对经济增速的过度强调是本届领导人履职后的一贯思路。中共十八大后首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稳增长”仅出现两次。次年，官方又为经济增速增添了“会带来后遗症”的要求。2014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官方更是明确诠释了新常态的内涵，要求主动适应新常态，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把转方式调结构放到更加重要位置。这一系列的变化所传递的信号是官方不会轻言大规模刺激来换取经济增速的短期增长，而将重点放在经济质量和效益的提升。

此举有效稳住了市场和地方政府的预期。而新常态背景下的坐标调整在不久后召开的全国两会上有望得到系统性的呈现。届时，官方料对全年经济增速目标进行微调，以服务于把调结构放在更为重要位置的要求。而在新常态的背景下，官方如何通过简政放权、鼓励创新、支持创业等政策安排打造新的经济点都将成为各方高度关注的事项。

中国经济新常态面临六大新机遇

美国《商业周刊》中文网 2015年2月6日

中国经济好不好，其实就是生产效率提升速度大不大。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会带来深刻的变化，既带来新挑战，也孕育着新机遇。在这样一个过程中，最关键的就是要把握机遇。

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副主任委员辜胜阻表示，“新常态”下的中国经济面临4个方面的阵痛：首先，钢铁、水泥、造船电解铝等制造业面临严重的产能过剩，制造业要“去产能化”；其次，地方政府负债率较高，金融要“去杠杆化”；再次，房地产调整阵痛；最后是环境的要求，环境要“去污染化”。

经济转型中的四大阵痛决定了我国正面临着较大的经济下行压力。同时，也将迎来更多新机遇，中国经济在新常态下，将面临六大新机遇。

第一是人口城镇化。人口城镇化进程将创造巨大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加速消费升级。2014年，我国城镇化率达到54.77%。城镇化未来发展的一个重要方向是经济发展空间格局的优化和城市群的建设。近年来，我国城市群的规划和建设急剧升温。

据统计，我国现有城市群总数已超过30个，预计未来5到10年内，我国城市群将涵盖全国815个城市中的606个，人口和经济规模分别占到城市总量的82%和92%。如今

我国重点实施的三大战略包括“一带一路”发展战略、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以及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这些都与城市群的建设发展紧密相连。城市群今后将成为城镇化的主体形态和主平台，是我国经济发展中最有活力和潜力的核心增长极，更将成为未来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中流砥柱。从这个角度上说，未来的竞争不仅是产业的竞争，更是城市群的竞争。

第二是经济服务化。消费升级将创造公共性服务、消费性服务和生产性服务的巨大发展空间。据世界银行预测，到2030年，我国服务业占比将大幅上升，社会结构和产业结构都将发生巨大变化。经济服务化的新常态将为企业带来丰富的发展机遇。应努力发掘新的经济增长点，关注养老、医疗、卫生、旅游、文化、物流业、互联网相关产业等领域的新发展、新动态。同时，要充分发挥政府与市场“两只手”的合力，提高民间投资参与的范围和比重，共同提高经济发展效率与质量。

第三是发展低碳化。资源环境瓶颈压力加剧、新兴产业勃发、消费者环保意识增强都将创造绿色低碳经济机遇。去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从资源环境约束看，过去能源资源和生态环境空间相对较大，现在环境承载能力已经达到或接近上限，必须顺应人民群众对良好生态环境的期待，推动形成绿色低碳循环发展新方式。2013年，国务院发布了《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十条措施；《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土壤污染防治行动计划》等也出台在即，将集中力量打好大气、水和土壤污染防治“三大战役”，绿色经济发展将带动数以万亿元计的“治大气”、“治水”、“治土”的投资，为企业带来更多商机。

第四是产业高端化。产业结构的水平要从低端、中端逐步走向中高端，对冲中国经济的下行压力。今后，我国应在大力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同时，加快传统产业优化升级。

产业结构调整的根本出路是创新，要通过创新使我国企业从价值链和产业链的低端走向中高端，这涉及到技术创新、产品创新、组织创新、商业模式创新、市场创新。通过营造“实业能致富，创新致大富”的环境，培育“宽容失败、鼓励冒险、兼容并包”的创新创业文化，推动合作创新和发展平台经济，鼓励企业自主创新，使企业真正成为创新主体。

第五是社会信息化。社会信息化是面对当前经济下行压力，突破发展瓶颈，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促进节能降耗减排，提升产业竞争力、产品竞争力的关键，是经济新常态下的一个新引擎。信息化可以从两个视角来考察：一是产业的信息化，用信息技术来改造传统产业的生产、经营模式；二是信息产业化。今后，互联网将改变城市、企业、金融等诸多领域。

新的产业革命的特点是“互联网+X”。比如“互联网+金融”，等于互联网金融；

“互联网+制造业”，德国人称其为“工业4.0”，这将是“第四次工业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互联网+城市信息化”，等于智慧城市。目前，智慧城市呈现出爆发式增长的态势，这将带来巨大的发展机遇。

第六是经营国际化。商务部统计显示，过去的一年，如果加上第三地融资再投资，中国对外投资规模在1400亿美元左右，约高出中国利用外资200亿美元，中国已经成为资本净输出国，这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

当前，中国国际化战略转型需要实现从产品国际化走向企业国际化，从商品输出大国走向资本输出大国，从“中国制造”走向“中国所有”，从出口导向转向投资立国，从大多数产品贴牌生产转向品牌创新，从低层次国际分工战略走向高层次国际运营战略，从世界工厂“打工者”向全球资源“整合者”转变。据有关资料显示，过去30多年，高储蓄率、高投资率、全球FDI、低要素成本等因素和优势支撑了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

2000年至2013年，全球经济GDP平均增速为3.68%，同期中国经济年均增速10.6%，几乎是全球平均增速的三倍。2014年，中国GDP总量可能达到10万亿美元左右。

然而，数量型扩张的经济模式已经难以支撑如此庞大的经济体量实现高速增长，特别是随着人口红利减少、生产要素成本上升、资源配置效率和要素供给效率下降，中国也面临着“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瓶颈。

中国需要克服速度焦虑，主动调试心态，寻找新的增长动力源。而创业创新型企业的发展 and 产业升级，则具备了新常态下我国经济发展将进入新阶段的全局性特征。

三农问题 县域经济

产量与质量并重 中国农业将转换发展模式

蔡永伟 新加坡《联合早报》中文网 2015年2月4日

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办公室主任陈锡文昨天承认，虽然中国当前的农业发展已取得巨大成绩，但过往以拼资源、拼消耗的农业发展方式，已对农业自身的发展构成越来越大的制约。为此，陈锡文昨天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记者会上解读今年的中央“一号文件”时强调，中国农业今后的发展必需加快改变以前单纯追求产量的方式，转为数量、质量、效益并重的发展模式，才能保持发展好态势。

所谓“一号文件”是指中共中央和中国国务院每年年初发布的首份政策文件。自2004年以来，一号文件连续12年聚焦“三农”（农业、农村、农民），凸显中国当局最关注的治理领域仍是农业问题。今年的一号文件本月1日发布，题为《关于加大改革

创新力度加快农业现代化建设的若干意见》。

陈锡文在记者会上首先肯定去年的农业发展“平稳向好”：一方面，粮食生产继续丰收，全年粮食产量比上年增长0.9%达1.2亿斤；另一方面，农民收入比上年增长9.2%达9892元人民币（约2140新元）。

这组数据意味着，中国粮食总产量已实现“十一连增”，农民增收则实现了“十一连快”。不过，陈锡文也警告，随着经济社会的深刻转型，农村改革发展面临的环境和问题更加复杂。

他一一列举中国农业今后将面临的挑战，包括农业生产成本快速攀升，国内大宗农产品价格普遍高于国际市场，农业发展的资源环境约束强化，农民增收的难度加大。

农产品走私入境加剧国内库存压力

他也称，不少境外农产品走私入境，加剧了中国农产品库存的压力。

今年的一号文件也进一步指出，中国农业资源短缺，开发过度、污染加重，如何在资源环境硬约束下保障农产品有效供给和质量安全，提升农业可持续发展能力，是必须应对的重大挑战。陈锡文认为，政府今后得积极推进农业发展方式的转变和农业结构的优化，具体措施可包括提升农业科技，加强农民的培训等等。

一号文件也首次提出了“推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建议。陈锡文介绍，农村除了提供初级农产品之外，也能对这些产品进行精深加工，借此延长产业链，提高附加值，同时还可在农村开展农家乐、旅游业等服务业，最终实现增加农民收入的目标。

在中国近年接连发生上海福喜食品安全问题、三聚氰胺毒奶粉事件等一系列食品安全丑闻的背景下，陈锡文也特别强调粮食安全的重要性：“粮食不能出大问题。”

今年的一号文件就将“提升农产品质量和食品安全水平”列在首位，并要求推进标准化生产、加强食品安全监管能力、强化地方政府法定职责、建立全程可追溯的食品安全信息平台等，彰显中国当局对食品安全问题综合治理的决心。

针对社会关注的转基因食品安全问题，一同出席发布会的中农办副主任韩俊受询时表示，中国今后将加强农业转基因生物技术研究、安全管理和科学普及，推动公众和媒体理性全面地看待转基因技术和产品，及其发展历史、现状、安全性和风险。

韩俊承认，中国在转基因领域总体上与世界发达国家的水平存在明显差距，但这个产业大有发展前途，因此中国在研究方面“不能落伍”，“市场不能都让外国产品占领”。

今年中共中央一号文件颠覆了什么？

2015年中央一号文件2月1日出炉。这份连续第十二年聚焦“三农”问题的一号文件，再次揭示中国高层将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的用意。同时，也被业界视为官方狠抓“三农”工作的“动员令”和“风向标”。

中央一号文件原指中共中央每年发的第一份文件，现在已经成为中共中央重视农村问题的专有名词。

每年一号文件发布后，各界都想第一时间找到一个“主题”，在过去的许多年份，一号文件的确有个别特别突出的方面，比如2011年的主题水利，2012年的主题农业科技创新等等。有报道称，在本质上，一号文件会对当年的农业、农村工作做出全局性的指导，比如说今年，要在文件里拎出一个“最重要”，恐怕是比较难的。

综观今年一号文件全文，一共涉及5大方面，分别是：一、围绕建设现代农业，加快转变农业发展方式；二、围绕促进农民增收，加大惠农政策力度；三、围绕城乡发展一体化，深入推进新农村建设；四、围绕增添农村发展活力，全面深化农村改革；五、围绕做好“三农”工作，加强农村法治建设。

在经济发展步入新常态、农业农村发展面临新挑战的背景下，此次一号文件又有哪些新精神、新部署及文件有哪些破题之举值得解读？

传递发展现代农业明确信号

【挑战】日益稀缺的资源和脆弱的生态环境，以及不具竞争力的价格，正对农业生产高投入高产出的旧有发展模式亮起“红灯”。不少农民感慨“地越种越硬、越种越薄，肥越施越多、成本越涨越高”，农业发展如何可持续，成为中国农业发展面临的新课题。

【文件破题】必须尽快从主要追求产量和依赖资源消耗的粗放经营转到数量质量效益并重、注重提高竞争力、注重农业科技创新、注重可持续的集约发展上来，走产出高效、产品安全、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现代农业发展之路。要实施耕地质量保护与提升行动，推进农业结构调整，强化农业科技创新驱动作用。

【专家解读】中国农科院农经所研究员朱立志：一号文件对“转方式”浓墨重彩，极具针对性，传递出中国必须走现代农业道路的信号。文件提出要不断增强粮食生产能力，这与以往更多地强调产量增长的表述有着明显区别。中国强，农业必须强。农业的强不是体现在产量上，而是体现在竞争力上，这意味着农业在“转方式”上将有更多突破。

推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

【挑战】在当前经济增速放缓的形势下，农民打工收入增长前景不容乐观；而在

家庭经营性收入方面，农业生产成本上升与大宗农产品价格低迷“双碰头”，老乡的种田收入增长空间进一步缩窄。新常态下如何让农民持续增收，无疑成为“三农”工作的一大新挑战。

【文件破题】努力在经济发展新常态下保持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持续缩小势头。富裕农民，必须充分挖掘农业内部增收潜力，开发农村二三产业增收空间，拓宽农村外部增收渠道，加大政策助农增收力度。

【专家解读】中国社科院农村所研究员党国英：文件提出推进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提出乡村生态休闲、观光农业的思路，对提升农业附加值，增加农民收入有一定帮助。此外文件提出推进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可进一步激活农村要素资源，为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提供了可能。

首提引导社会资本投向农村

【挑战】随着工业化、城镇化深入推进，农村人多地少水缺的矛盾加剧，特别是随着农村社会结构加速转型，农户兼业化、村庄空心化趋势明显，谁来种地、如何种地的问题严峻地摆在面前。同时，农村土地、资金等生产要素的流动长期被禁锢，已成“三农”发展的一大挑战。

【文件破题】必须把农村改革放在突出位置。要加快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引导土地经营权规范有序流转，推进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开展赋予农民对集体资产股份权能改革试点，稳步推进农村土地制度改革试点。

【专家解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所所长叶兴庆：文件部署的这些改革，意在通过市场化手段，激活被长期压抑的土地、资金等生产要素和农村产权，实现其有序流动和合理配置，让农村“沉睡的资本”得以“活”起来。

首次大篇幅聚焦“依法治农”

【挑战】农村是当前我国法治建设相对薄弱的领域，一些地方非法征用农民土地、非法占有农民集体资产等问题时有发生，“法不下乡”成为农村法治的困局。

【文件破题】必须加快完善农业农村法律体系，同步推进城乡法治建设，善于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做好“三农”工作。要健全农村产权保护法律制度，加强农村改革决策与立法的衔接，农村重大改革都要于法有据。

【专家解读】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教授郑风田：文件首次用大量篇幅聚焦法治，可见“依法治农”已成推进“三农”发展的重要工作。文件提出农村重大改革要于法有据。农村改革必然涉及利益调整，更需要用法律为改革保驾护航，一方面可保证农村改革的顺利推进，另一方面也能杜绝一些人“以言代法”现象的发生，保护农民权益。

推进农村土地制度改革试点

【挑战】随着工业化、城镇化深入推进，农村人多地少水缺的矛盾加剧。同时，农村土地、资金等生产要素的流动长期被禁锢，产权归属不清晰，如何“唤醒”农村大量“沉睡的资产”，已成“三农”发展的一大挑战。

【文件破题】要加快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引导土地经营权规范有序流转，推进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开展赋予农民对集体资产股份权能改革试点，稳步推进农村土地制度改革试点。

【专家解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所所长叶兴庆：当前中国农村面临的问题，仍然在于旧体制的制约，唯有通过改革来破题。“文件部署的这些改革，意在通过市场化手段，激活被长期压抑的土地、资金等生产要素和农村产权，实现其有序流动和合理配置，让农村‘沉睡的资本’得以‘活’起来。”

增加农民收入建设美丽家园

【挑战】在当前经济增速放缓的形势下，占农民收入大头的打工收入，其增长前景不容乐观；而在家庭经营性收入方面，农业生产成本上升与大宗农产品价格低迷“双碰头”，老乡的种田收入增长空间进一步缩窄。

【文件破题】文件明确提出，努力在经济发展新常态下保持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持续缩小势头。文件强调，富裕农民，必须充分挖掘农业内部增收潜力，开发农村二三产业增收空间，拓宽农村外部增收渠道，加大政策助农增收力度。文件提出，加快提升农村基础设施水平，推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提出今年解决无电人口用电问题，全面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农村社会文明程度，让农村成为农民安居乐业的美丽家园。

【专家解读】中国社科院农村所研究员李国祥认为，和以往一号文件相比，今年文件在强调水、电、路等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同时，还强调公共服务水平及文化建设，提出要创新乡贤文化，把农村精神文明建设提升至新的高度。由“物”到“人”，新农村建设迈向“看得见青山绿水、留得住乡愁”的新阶段，内涵更为丰富。

首度纳入农垦改革

【挑战】现有农垦土地在资产抵押、资本运作上存在一些不规范现象，既加大了国有土地资产流失的可能性，也约束了农垦进一步做大做强，这方面迫切需要改革。

【文件破题】过去几年中央一号文件曾零星提及“国有农场改革”，今年一号文件则首次将农垦改革纳入，并将之视为改革重点。文件提出，加快研究出台推进农垦改革发展的政策措施，深化农场企业化、垦区集团化、股权多元化改革，创新行业指导管理体制、企业市场化经营体制、农场经营管理体制。

【专家解读】北京相关学者指出“国有农场改革将是农垦改革重点，国有农场面积极广、商品粮种植程度高、现代化程度高，通过引入工商资本和机制改革，可以打造

成为农业现代化试点基地和‘走出去’的基地。

社会观察

中国需要改变思路提高城市生活质量

美国《商业周刊》中文网 2015年2月5日

如今，北京建设环路，高楼林立的范围被进一步扩大。首都和天津之间的廊坊附近，挖掘机和水泥搅拌机正在建设下一条环路。大部分七环将穿过河北省，而不是首都北京，其中一部分路线距离北京中心有175公里（如图）。七环（实际上是六环，但由于某种不明原因，没有一环）是现代中国城市的象征：巨大，蔓延，充斥着车辆。虽然要再过一两年才能完工（以及评估使用），另一条更长的环路正在规划中。

和许多中国的基础设施项目一样，新的环路展现了工程技艺，相比之下，中国在城镇规划方面的成功就没那么明显了。

在过去的三十年里，城镇的过快发展推进了中国的崛起。农村人口涌入城市，使城镇人口增加了5亿——这是世界上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发生的最大规模的人类活动。

如今中国城镇人口占一半。这些人有的住在公寓的地下室或天井窝棚。但大多数中国城市的环境都没有像许多发展中国家那样肮脏。

城市发展不仅仅使中国有了许多大城市——其中100多个城市人口超过百万——而且还出现了一些超大的城市。

去年年底，中国政府终于承认了这些城市的特殊性质，提出了“特大城市”概念，指那些包含卫星城在内，人口超过1000万的城市。世界上符合“特大城市”特点的城市只有30个，其中中国就占6个：上海（2300万人）、北京（1950万人）、重庆（1300万人）、广州（1200万人）、深圳（1100万人）和天津（1100万人）。另外，中国有10座人口在500万至1000万之间的城市，其中，至少武汉人口将在10年内超过千万。

中国的经济发展和创新都依赖城市，但中国却未能充分发挥大都市圈的作用。

咨询公司麦肯锡称，在环境保护、经济发展、资源高效利用和福利提供方面，人口在150万至650万之间的中型城市优于更大的城市。不少居民的生活水平获得了很大提高，但他们对生活水平会否继续改善心存疑虑。大城市污染重、消费高、交通拥堵。北京交通的行进速度仅仅是纽约或新加坡的一半。

大多数的中国城市都是中央规划的，生活和工作都集中于一个“工作单位”。

《中国十亿城民》（china's urban billion）的作者Tom Miller认为，城市“被建造

为生产中心而不是消费中心”。

这些城市规划的重点不是贸易、服务甚至社区，而是工业。虽然这些工作单位已经消失，但非人性的建筑还存留。大多数新的开发建造在400-800米长的大街区内。

中国已经将其社会主义梦想，转变为美国式的梦想，有汽车和蔓延的城郊。

汽车数量已达6400万辆，在过去的十年增长了十倍不止。巨大的街区和对汽车的欲望结合，常常导致交通大堵塞。街区大，交通分流的街道就少。指导路线要求每500米要有一条城市主干道，每一公里有一条八车道公路。

北京建设了环路和辐射状交通系统，旨在提供进出城的快速路，绕开城市车流，链接卫星城镇。这种想法是不错，但问题是工作地点依然集中在城市中心。车流经过漏斗一样的高速公路导致了交通大堵塞。

对于农民所有权的定义不清也助长了这种蔓延。官员能够轻而易举地以低成本征用农村土地，而且比起开发现有城市地区便宜得多。由于工业用地获得极大补助，工厂并没有搬到便宜的郊区，而是留在了城市。

自2000年以来，城市土地总量增加了一倍不止。40%的城镇人口增长来源于城市吞并了农村。城市的蔓延导致人口分布更加稀疏，中国特大城市的人口密度比世界上其他地方小。以韩国首都首尔的人口密度，广州可以再容纳400万人，深圳可以再容纳500万人。向外延伸是要付出代价的。从遥远郊区的缓慢通勤增加了燃料消耗，降低了生产力。

基础设施方面的庞大支出极大的改善了城市之间和城市内部的交通。

从1992年起，中国每年将国家收入的8.5%用于基础设施，比欧洲、美国（2.6%）、印度（3.9%）要多的多。但是城市居民还在不停的抱怨。

基础设施建造公司Aecom的Sean Chiao 指出，通常建造地铁都属于工程项目，车站位置根据规定的距离确定的，而不是人们的需求。由于所属管理机构不同，公交、地铁和铁路网络整合不佳。规划者经常忽略200多万没有户口的居民的需要。因此，城市中医院、学校不足，房价过高。

然而，今年中央政府开始淡化GDP增长在地方官员考核中的重要性。

这将使地方官员能够放开手脚，把更多的钱花在改善城市，而不是铺路上。一些城市在考虑限制汽车的使用。

北京成了交通大堵塞的地区。为控制污染，改善交通状况，八个城市（包括除了重庆以外的其他朝大城市）限制每年新发行的牌照数量，一些城市进行限号。地铁系统快速增加：12月，仅仅北京就开通了四条新线路，41个站点。

但还有很多方面需要改进，城市中心停车收费太低；实施法律强制禁止在人行道或安全岛停车；公交车可以使用大马路的中央通道；还应当重启曾经普遍的自行车

道，以鼓励自行车出行。世界银行指出，中国目前的城镇化水平是54%，与目前人均收入水平应有的70%相比，远远落后。人口迁移浪潮将会继续，到2030年，中国居住在城市中的城市人口数量将超过10亿。中国需要改变思路提高城市生活质量。

新城镇化亟待实现的三个转变

张立 香港《经济导报》2014年12月16日

当下的中国，城镇化率已超过50%，这表明一半以上的人口生活在城市里，同时也表明城镇化过程进入了后半程这一加速阶段。然而，城镇化过半不仅意味着人口的迁移，同时，似乎也意味着社会各领域变革的时空格局最终到来。

中国政府今年3月公布的《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勾画了一个从现在到2020年的大规模建设蓝图，其内容涵盖交通网络、城市基础设施和住宅房地产等诸多领域，并打算再让1亿农村居民迁入中国不断发展的城市中。在中国经济增速逐步放缓的大背景下，政府部门希望此举为未来经济前行增添动力。

当下的中国，城镇化率已超过50%，这表明一半以上的人口生活在城市里，同时也表明城镇化过程进入了后半程这一加速阶段。然而，城镇化过半不仅意味着人口的迁移，同时，似乎也意味着社会各领域变革的时空格局最终到来。

有分析所指出，中国社会正在迫近一个新的历史转折点，即改革进入深水区。以低成本、强势政府主导为核心特征的中国经济模式和以高消耗、城市要素供给不可持续为核心特征的传统城镇化发展模式，积累了巨大的社会风险：劳动力“刘易斯拐点”现象出现；城乡两元化导致农民融入城市难题；社会贫富差距接近警戒线；社会保障不完善引发疑似“中等收入陷阱”初级阶段的现象；以出口和投资为驱动力的衰减共振；地方政府“公司化”并陷入GDP崇拜综合症不能自拔；法治不断给经济发展让路；生态污染危机日趋严重；食品安全危机和公众信任危机爆发；企业在“国进民退”的同时上演着“国强民弱”；政府监管过度导致成为权力寻租的乐园；地方“造城运动”和“鬼城”频现……这些问题都有待于在深化改革中逐步化解，如此经济社会才能进入稳步发展新阶段。

关于新型城镇化的设想可谓五花八门，各种流派和观点各有侧重，有些甚至是互相排斥的。但无论怎样，新型城镇化的核心离不开“创新、和谐、公平、自由”等词汇。新型城镇化的核心归根到底是人的城镇化，其能成功与否，关键取决于能否深层次地理清和解决好以下三个转变。

城市化向新城镇化的转变

目前，全球各发达国家的城市发展，都在“回归自然”，都在强调走“生态保障型”

的设计理念与实现路径，普遍持“反大都市化”观点。事实上，欧美城市化进程，即便是在二战后经济与人口高速发展阶段，也始终未脱离人性化的轨迹，其城市化发展脉络清晰：村、镇、中小城市、大城市鳞次栉比，相互缠绕，不存在“突兀”的所谓城市群。尤其是德国的城市化发展，从设计理念到空间结构布局，都充分体现出人们今天正在提倡的“城镇化”特征。

中国之所以选用“新型城镇化”而未按国际惯例使用“城市化”一词，其出发点与落脚点均在于解决占中国人口过半数的广大农民的归宿问题。这就必须从中国国情出发，在“镇”字上下功夫，在“镇”字上寻求突破，在“镇”字上最终求得落点。那种通过在“图上作业”，在全国地图上“圈上几个圈”，再下达指令搞上几个所谓“城市群”，试图以此来“一劳永逸”地解决中国城镇化发展的路径问题，其设计的逻辑起点就存在错误。

之所以不能提倡“城市化”，主要原因是其导向易使人们的行为走向大都市化。而“城镇化”的“镇”，并非是狭义的村镇，而是指广义的非大都市，可以将其理解为习近平所言的小城市。不可否认，迈向大都市是广大百姓之所欲，但却不为中国国情能承载，更不应成为科学决策的依据。

中国城市承载力持续下降，以水资源为例，东部地区经济发达，一个东部的小城镇的水消耗量与中部地区中等城市及西部地区大城市持平。这说明，东部地区的人口聚集已经接近极限，空间布局如若再以这种超大方式作为逻辑起点去设计，去推动产生新的城市群，甚至到水资源更为缺乏的中部、西部地区去复制若干个城市群，后果都是严重的。“城镇化”发展路径不单纯是理念问题，更与国情和现实关联，路要一步步走，饭要一口口吃，城镇化发展也要如此。

二元结构向城乡一体化的转变

实现城乡发展一体化，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内在规律，是中国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内容和方向。从理论上讲，工农、城乡的内在联系决定了城乡要一体化发展。工业和农业之间、城市和农村之间存在着内在的有机联系，彼此是相互依赖、相互补充、相互促进的。城乡一体化发展，就是把工业和农业、城市和农村作为一个有机统一整体，充分发挥彼此相互联系、相互依赖、相互补充、相互促进作用，特别是充分发挥工业和城市对农业和农村发展的辐射和带动作用，实现工业与农业协调发展。

推进中国城乡发展一体化，主要障碍是城乡二元结构。而消除“二元结构”社会，是中国城镇化建设最具标志性意义的战略目标。完成这一历史任务，方能使中国现代化建设，补齐失缺度，具有完整性；方能使中国小康社会建设，解决均衡度，具有充实性。

资源战略专家宋健坤指出，从目前看，要成功消除“二元结构”社会，必须发挥

“孵化”，“消纳”，“反哺”这三大功能作用。

所谓城镇化建设的“孵化功能”，是指在城镇化建设过程中，必须立足于在农村领域推进小城镇建设的同时，积极推动产业向中西部广大农村转移，实现以产业发展来“孵化”城镇化的建设。目前在全球范围看，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化建设没有一个是被公认成功的，其城镇化建设失败的主要原因，均在于缺少以产业作动能的支持。

所谓城镇化建设的“消纳功能”，是指在城镇化建设过程中，首先要客观地评估现有的城镇化发展的“承载力”水平，其后要对城镇化未来发展的目标期设定一个“安全阈值”，这样方可在预知的合理发展空间内，让现有城镇做到积极有序地接纳“新成员”。

所谓城镇化建设的“反哺功能”，是指在城镇化建设过程中，中央政府要加大对农村经济与社会发展中的一次财政支持力度与对农民的二次财政转移的支付力度。这样，方可有效地推动农村经济的快速发展，大幅度缩小城乡居民的消费差距，使农民尽快分享到国家高速发展的红利。从政策实施的效果看，仅靠对产出效益甚差的农产品进行有限度的直补，无法从根本上消除城乡居民的差距，更无法解决农民最盼望解决的实际困难。

中国要消除“二元结构”社会，实现城乡一体化的发展目标，还要走相当长的路。“孵化功能”、“消纳功能”、“反哺功能”成为消除中国社会现有“二元结构”的三大基本功能。这三大功能的发挥，可以有效缩减目前的城乡差异，缓解中国广大农村积压已久的矛盾，是现阶段解决“二元结构”差异化的积极手段。

向城乡土地同权同价的转变

中国城镇化中最突出的问题是如何进行农村土地制度的改革和创新。农村土地是集体土地所有制，土地数量固定，但用地性质可以变化，不同用途土地的差价悬殊，这就使得土地溢出“分配和再分配”的利益问题。中国城镇化的下一步发展，最大难点问题在于对现有农村土地制度的改革。目前，城镇化在部分地区的推行，事实上已经演变成“赚取土地差价的运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吴敬琏指出，近年来政府从征购价格和土地批租价格间所赚取差价最低估计为30万亿人民币。

因此，建立“新型土地”制度，成为中国城镇化建设中最艰巨的任务。土地问题，历来是中国经济与社会发展最为敏感的问题。中国城镇化建设过程所环绕的主题，实质就是土地的制度设计问题。

放眼望去，在土地资源日益紧张的今天，占用大量土地的高尔夫球场、没有效益的开发区，并不鲜见；地方土地财政膨胀出的鬼城、小产权房，比比皆是。由于土地资源的价值，在中国只有通过管理者之手，才能经过“指针”、“价格”、“规模”、“土地性质转换”等各种名目，实现价值的增值，由此产生了巨大的利益黑洞，为贪腐分子提供了

可乘之机。

在新型城镇化进程中，应该反省已有的土地财政政策的种种弊端，并切实加以解决。通过改革让土地的成本大幅下降，让城市土地真正成为外来人口落户的载体，使其安居乐业，只有这样，城市发展才能继续释放中国人力资源的红利，抑制“刘易斯拐点”的过早到来。此外，户籍制度和土地制度改革应协调联动，户籍上，让农民工就地市民化并和城市市民享受同样的社会保障体系；土地上，参照同级城市用地价格提高农村征地补偿水平，逐步实现城乡土地同权同价。

土地制度如何改革？是将土地从农民手中“赎买”后再全面实施土地资源的市场化配置；还是有条件地将集体土地的“使用权”全面国有化；或是在国有体系下继续实施土地“使用权”的“市场化配置”，都必须全面衡量利弊，审慎推进管理权的选择方式，是向现有地权拥有方倾斜，还是向索取地权的利益方倾斜，亦或是增加自己的“权利地租效益”，也需要仔细斟酌。目前看，土地制度无论以何种方式设计，最应坚守的原则底线，是要避免城镇化成为新一波掠夺农民土地的全面运动。

综合治理

“空气生死状”背后的中国式尴尬

香港《明报》2015年2月3日

每到冬季，空气污染令许多北京人焦虑。国务院发布的《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要求北京在2017年PM2.5控制在60。北京市长王安顺回忆，自己当时带着壮士断腕的决心签订了这份“生死状”。

王安顺说：“如果空气污染（治理目标）到2017年实现不了，领导说了既是句玩笑话，也是句分量很重的话，‘提头来见’。”然而今年地方“两会”考核时，却发现去年北京市PM2.5实际下降4%，未完成5%的下降目标。面对媒体对“空气生死状”的尴尬追问，王安顺也只好说这既是玩笑话，也表达决心。

王市长的尴尬背后，其实是在现阶段的中国，治理空污这一行为本身，存在着难以解决的结构难题。尤其在当前环境压力严重与经济增速放缓重叠，这一结构难题就更加难解。

另有一组数据显示，2014年北京GDP增速为7.3%，河北为6.5%，均在全国排名倒数。河北距离原先制订的8%GDP增速，相差高达1.5个百分点，北京周边地区治理空污是直接原因。

治理空气污染必然从企业入手，而在内地现在的发展阶段，大部分企业都处在中

等或高污染状态。以相对发达的江苏省为例，重污染行业都占GDP达到59%，北方省市的这一比例只会更高。

不少官员喊出“为了空气质量、宁可牺牲GDP”的口号。但GDP增速真的大幅下降，马上带来企业关停、税收减少、失业增多等连锁反应，无论官员还是民众都难以承受。产生这种几乎无解的矛盾，关键在于缺乏早期的预防。比如在经济增长相对快速的时段，进行环境污染的防治，企业所面对的压力就会更小。然而，不少决策者似乎过于认同“先污染、后治理”，这句话的潜台词仿佛是“污染没有出现，就不需要治理”。

其实在环境保护的规律中，预防是更重要的一环，相比之下治理的成本远远大于预防。即将担任环保部长的原清华大学校长、环境学者陈吉宁曾表示，“保护优先、预防为主”是非常重要的原则，可是现在的法律体系，看不到“哪一条体现了预防为主”。

以台湾为例来看，早在1955年台北就对生煤使用进行管制，1975年统一制定了空气污染防治法。当时台湾的空污尚未形成严重影响，决策者精英着眼长远，汲取日本、美国的经验，认为台湾未来也可能发生类似问题，为之后的空气治理打下良好基础。

当前内地社会的环境意识终于被空气污染唤醒。但是PM2.5几乎成为环境污染的代名词，土壤、水源、城市垃圾等问题，都被很大程度忽视。

例如，并不复杂的垃圾分类，就可以对城市垃圾进行有效管理与回收，但内地政府并没有展现出大规模推动的决心。这些事先预防的措施，在未来城市垃圾问题爆发的时候，又很难短期发挥作用。

总之，环境污染往往是长时间的忽视所致，又导致需要更大代价治理。中国现在的环境污染快要达到极限，必须有“生死状”的决心；但也不能“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要重视“预防为主”的环境规律，怀有对未来负责的长远眼光。

经济下行 环境治理添压力

《香港经济日报》2015年2月27日

今年经济下行压力大，环境治理会否“让路”？

上个月国务院总理李克强表示若经济增速降太多恐影响就业。北京经济学者胡星斗认为，虽谈不上“让路”，但经济下行会为环境治理增添压力。

去年两会上，李克强在其担任总理的首份政府工作报告中坦承，雾霾天气范围扩大，环境污染矛盾突出。“必须加强生态环境保护，下决心用硬措施完成硬任务。”

雾霾虽严重 经济下行更添忧

根据官方公布的《2014年中国气候公报》，去年全年内地平均霾日17.9天，京津冀霾日61天，较2013年多25天。而刚过去的春节假期，中央气象台则直接发布，北方多雾霾，不适合大量燃放烟花爆竹。

雾霾问题仍严重，今年两会势必再成焦点。但值得注意的是，与去年总体形势不同，今年经济下行压力巨大，2014年经济增速已降至7.4%这个24年低位，外界普遍关注今年目标是否下调至7%。

今年1月26日，一群专家学者在中南海对今年政府工作报告建言，有人提出经济增速可以慢一点，少些污染，把雾霾等问题治理好。但总理李克强回应，经济增速慢一点，放在北京不是太大问题，但是放在全国，就有一个就业压力的问题，经济增长速度下降多了，对就业和社会都会造成压力。

李克强的回应，言外之意似乎是在说，在目前经济下行压力较大的情况下，稳增长保就业还是要优先于治雾霾。

京“APEC蓝”经济放慢作代价

若综观历史，也可见经济和环境难以实现“双赢”。

一个典型例子即是去年11月APEC会议期间，京津冀地区道路限行并关停污染企业，北京一度迎来“APEC蓝”。但受企业停产影响，当月经济数据出现疲软，工业增加值增速逊于预期，制造业PMI也创8个月低。

经济目标是否“保7”成为今年两会最大焦点，在此“保增长”思维下，环境治理是否会否为经济“让路”？

学者：经济垮了 社会易动乱

北京理工大学政府经济学教授胡星斗接受本报专访时表示，不能说环保为经济“让路”，因为理想上仍是既重视经济又重视环保，并非区分先后。但实际很难做到。

他指出，毕竟中国一直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若环保垮了会导致民众健康问题，而“经济垮了是社会动乱”。“（今年两会）经济下滑与民生是热点，保增长、抑下行、促转型是重中之重，遏制污染雾霾会被大家讨论，但是会清谈一下，不会冲击经济建设的中心地位。”

胡星斗还表示，环境治理受压，也与一些地方仍以GDP作为考核官员业绩的指标有关。虽然中国有条件、有技术实现一边污染一边治理，但不少官员“骨子里”仍看重“经济先行”，认为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中国，也应该仿效发达国家“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

基辛格谈中国崛起及世界局势

张蔚然 澳门《华侨报》2015年1月31日

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当地时间29日在华盛顿阐述了他对中国崛起的看法。他表示，中国成为一个有巨大容量的经济领域竞争者，美中在处理双边关系时一定会冒犯对方，未来双边关系的发展方向将在我们这个时代发挥决定性作用。

年逾90的基辛格目前长居纽约，甚少在华盛顿出席公开活动。他当天与前国务卿舒尔茨、奥尔布赖特一起，出席国会参议院军事委员会听证会，就美国国家安全战略与面临的全球性挑战发表看法。

基辛格表示，中美关系是任何亚洲体系的一个“特别方面”，且经常被描述为守成大国与崛起大国之间的关系。两国领导人已宣布将在合作基础上处理双边关系，但两国也有一些重要人士强调了双边关系中对抗的一面，中美关系的发展方向将在我们这个时代发挥决定性作用。

他说，中国的崛起会带来一系列新问题，中国成为一个有巨大容量的经济领域竞争者，由于中国的存在是一种必然，美中在处理关系的时候一定会冒犯对方。

谈到此处，基辛格话锋一转，表示中国的问题完全不同于中东问题，美国短期内面临的最直接问题是除掉“伊斯兰国”，避免让当前局势发展成一场不知该如何收场的战争。

美国总统奥巴马近日访问了印度，他是首位任期内二访印度的美国总统，美印关系显著升温。基辛格认为，印度与中东和亚洲都有文化联系，美国自然欢迎印度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但其重点应当是社会和政治合作，而非美印结成“战略集团”。

在乌克兰问题上，不少美国议员都主张美国向乌克兰提供防御性武器，进一步干预地区局势，但基辛格反对这种倾向。他认为，考虑到莫斯科距离俄乌边境的距离，美方采取的任何行动都会给俄方带来安全方面的暗示。美国应当首先搞清楚在该地区的战略目标、到底愿意“走多远”，在目标尚未明确的情况下就开始军事接触，他个人对此感到不安。

总体而言，基辛格认为美国目前处于自相矛盾的境地，以衡量国家能力的标准而言，美国正处在塑造国际关系的有利位置，然而环顾世界，美国正在遭遇动荡、冲突和混乱。在这种背景下，美国尤其需要加强与加拿大、墨西哥的合作，这有助于塑造太平洋和大西洋地区的秩序。

基辛格被广泛认为是美国最有建树的国务卿之一，是推动中美建交的功臣，还曾

因越南停火谈判成功而获得诺贝尔和平奖，他当天现身受到高度关注，但迎接他的不仅有掌声，也有“臭鸡蛋”，多位反战人士当天出席听证会，指责基辛格犯下战争罪，应立即被逮捕。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主席麦凯恩坚决捍卫基辛格，指责这些抗议者是“低级人渣”。

为何亚洲经济发展最具潜力亮点？

美国《商业周刊》中文网 2015年2月9日

总体来说，从2008年金融危机到2013年这几年里，全球金融危机似乎并没有对亚洲经济发展有太大影响，亚洲地区经济发展势头强劲。亚洲开发银行曾认为，经济发展最重要的内容是农业，面对人口增长如何减少贫穷与减少饥饿。

然而，近半个世界以来，亚洲经济增长表现较好，贫困人口也大幅减少，贫困人口所占比例下降，日本和澳大利亚的那个国家人均平均购买力均上涨。

一般地说，每个国家或地区经济增长因具体分析。

例如，菲律宾人均收入远远超过了泰国，韩国人均收入也增加，印度虽然仍然是一个中等收入偏下的国家，但通过高增长很快就可达到更好。尤其是中国，经济发展潜力很大，通过可持续发展与经济增长很快人均收入将达到中上等以上水平。

亚洲开发银行行长中尾武彦（Takehiko Nakao）近期访问了亚洲二十多个国家，一直从事有关太平洋和亚洲国家经济发展研究，并于高层领导有许多坦诚的讨论交流，在日本财政部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工作一段时间，中尾武彦认为，经济发展需考虑八个基本方面：

第一，能源、公共铁路基础设施建设等基础设施投资，这些建设有助于发展国家工业与吸引外国直接投资。道路网络有助于城市的学校与医院发展，也能增加劳动岗位，基础设施建设也是亚洲开发银行主要贷款核心区。

在许多发展中国家，基础设施建设所占比例不高，一些发展中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投资仅占公共投资的5%，甚至更少，去年基础设施投资增速为1.3个百分点。

为了确保投资，各国正在推进私人资源以增加税收支持基础设施建设投资。

第二，教育与卫生。亚洲开发银行正在努力帮助一些国家，如孟加拉国提高职业培训，支持医疗保健中的信息技术投资，许多国家初中高中质量参差不齐。

第三，金融监管与稳健财政货币政策。一些亚洲国家通胀率超过10%，赤字较高，令人鼓舞好消息是，20世纪90年代后许多国家更注重稳健货币财政政策，加强监管与金融监督。

第四，私营部门活跃与贸易。过去在一些国家，如印度和印尼，重点行业国有

化，进口替代工业化，采取价格控制等。而如今，随着全球化深入，外国直接投资于海外技术转移等发挥了更大作用。

从韩国和新加坡经济发展看，私营部门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给予企业适当指导与优化公共财政分配领域，促进经济多元化发展。

第五，结构改革。印度表示，进一步开放贸易，简化法规，削减能源补贴，推进结构性改革。亚洲银行支持降低关税，简化海关手续。

第六，国有企业透明度与问责制。亚洲国家越来越意识到，企业之间更好的透明度与问责制，解决腐败问题能够促进非生产活动增长。

第七，通过税制改革，减少贫富差距，通过职业培训提高劳动者素质，提高收入，增加中产消费，促进经济政治稳定。

第八，政治稳定也有利于经济发展，斯里兰卡经济增速为7.5%，归功于少数民族民主融合，周边国家摩擦冲突的消失。菲律宾最近达成了全面和平协议，促进了经济复苏增快。

以上是八个基本方面，除此之外，推进技术创新，提高劳动者技能，提升产业结构，培育可持续发展，社会保障、环境保护、人力资本、自然资源、文化与养老等方面均会做得越来越好。

学术前沿

两会文化领域提案

3月5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上作政府工作报告时提出，2014年我国文化体制改革继续推进，文化创意产业蓬勃发展。今年两会期间，文化产业仍然备受关注，来自各个行业的代表、委员们就文化产业立法、文艺界反腐、版权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推进中外文化交流等焦点问题提交了议案，中国将引发新一轮的文化浪潮。

关注国民素质和形象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何建明**：提案关注的是“如何在国际上提升国民形象”。中国现在发展很快，我们的海外市场很大，走出国门的有将近八九千万人。但是前几年我写外交题材报告，在海外走了一圈，发现一个问题，我们中国人一方面勤劳能吃苦，另一方面却在公共场合声音大、德行不好、购物财大气粗，仍然是在哪儿都不太招人待见，基本素质的确有待提高。文化修养的提高是大工程，已思考几年时间，今年将在提案中呈现。（搜狐文化 2015年3月4日）

将学前教育纳入到免费教育 全国政协委员、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莫言**：如今，农村幼儿园的建设有了很大的发展，学前教育普及率也很高。但在发展的同时也发生了

很多问题，学校教学设施不配套，老师水平参差不齐，幼儿教学理念不太符合儿童心理特点等，所以第一个提案是希望能够完善农村幼儿园的基础设施和师资配置。第二个提案也是集中在学前教育方面，他希望能在立法的层面上给学前教育给与关注，学前教育是所有教育的基础，国家进一步富强之后可以考虑学前教育纳入到免费教育的范畴。（东方网 2015 年 3 月 5 日）

联合各类资源推进高水平专业化智库建设 全国政协委员、华东理工大学实验室与装备处处长**蓝闽波**：如果我国建立的智库在研究内容上更加全面，给出的观点更多元化，对我国在科技和产业发展方向的把握、对政府的决策将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我的提案是《联合各类资源，推进高水平专业化智库建设》。建议可以适当开放机构的设置模式，即允许多种经济体形式存在，同时加大力度鼓励国际上专业智库与国内机构的合作，逐步形成具有我国特色的专业智库；采用政府购买服务的形式，优先购买高质量的研究报告以及充分发挥科技学会（协会）的作用。（上海教育新闻网 2015 年 3 月 4 日）

以立法推动全民阅读 全国政协常委、民进中央副主席**朱永新**：阅读推广工作是一件所需时间长、结果见效慢的文化工作。无论是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还是各级教育部门，无论是官方机构还是民间组织，在具体的阅读推广工作中，必须要依靠更多抓手，才能简单高效地开展活动，才能保证阅读推动的可持续性。为此，建议把每年的 9 月 28 日设立为“国家阅读节”，并认为这是为具体工作提供着力点的最简便易行但高效长效的一种方法。我建议，要发挥全国各级图书馆、城乡各图书室、各学校或教育机构等场所的作用，作为全民阅读基地和阅读节的主要活动场所。他认为，全民阅读的工作，应该以公益性为主，以购买民间服务为主。无论从图书出版、图书销售、图书借阅等环节，还是从图书节活动举办上，都是急需政策支持、急需经费支援、急需各方协力的。推动全民阅读的工作应以公益性为主，更好地增益社会正能量，辅助以商业运作，让阅读节活动更为深入人心。要继续推进阅读立法工作，用法律保障全民阅读的战略地位和国家阅读节的合法性。依法治国是中国的发展方向，阅读作为构建精神基石的工作也不例外。（《现代教育报》2015 年 3 月 5 日）

化解“知识无力感”需制度给力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矿业大学(北京)副校长**姜耀东**：对于近日社会热议的“知识无力感”话题，我认为，要解决“穷二代”的“知识无力感”困惑，归根到底还要靠不断改进的制度，从制度上阻断社会财富的不合理遗传，从制度上为贫困人口改变命运提供保障、给予贫困人口改变命运的手段和能力。不光存在城乡之间的贫富差距，城市中也存在大批低收入群体。目前，贫困代际传递已经出现，两极分化的社会风险在不断积累。（搜狐网 2015 年 3 月 4 日）

文化遗产保护问题突出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国家画院常务副院长**卢禹舜**：在本

届政协会议中提出了“推进文化遗产保护类公共文化服务”的提案。文化遗产保护类单位是为研究、教育和欣赏的目的，对人类和人类环境的物质及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搜集、保存、研究、传播和展示，为社会和社会发展服务、向公众开放的永久性、公益性文化机构，也是国家、民族、城市的。”关注文化遗产保护的话题，是因为我在多年的工作中意识到当下的诸多问题，例如文化遗产的保护、基础设置落后、展陈水平低、文化资源开发不足等。为进一步推进文化遗产保护类公共文化服务，卢禹舜提出建议：第一、进一步强化“观众为主体”的服务理念。第二、创新思路，多方取经，充分利用科技手段，以多样化的展示和传播方式满足人民不同层面的需要。第三、充分利用馆藏资源，选用专业设计团队合作开发艺术衍生品，使文化遗产作为“活的”文化产品走进人民生活，更好地发挥文化传播的功能。第四、充分利用公益广告、微信平台等，加强“自我宣传”。第五、持续加强人才队伍的培养和培。

（雅昌艺术网 2015 年 3 月 5 日）

吁明确文字作品的网络付酬标准 全国政协委员、国务院参事、著名作家**张抗抗**：呼吁要尽快制定文字作品网络付酬的细化标准，维护广大网络写作者的基本权益，保护广大作家的信息网络传播权及获酬权，促进网络文学的健康发展和广泛传播。根据《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第 2 条规定，“除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外，任何组织或者个人将他人的作品、表演、录音录像制品通过信息网络向公众提供，应当取得权利人许可，并支付报酬。”虽然该条例规定了网络使用作品应当付酬，但国家一直没有出台统一的付酬标准。各大网站基本是自行制定付酬方式和付酬标准，更有不少网站故意压低或拒付报酬，特别是目前的网络转载数量庞大，免费转载、不付稿酬的现象十分普遍，严重影响了作者的稿酬收入。（《文化报》2015 年 3 月 5 日）

专家学者论经济

中国将引发新工业浪潮 北京大学教授、著名经济学家**林毅夫**：中国目前已经到了从“引进来”到“走出去”的发展阶段。中国现在是世界第三大外资提供国，将来可能还会更大。现在面临的问题是中国企业心理准备严重不足，人才准备严重不足。除传统获取资源、建造基础设施和进入到当地市场三种类型的对外投资外，展望未来有两种新的越来越重要的对外投资：一是到发达国家获取技术，通过到海外通过并购的方式，或者是用购买专利的方式，把这些技术引进来是有利于加快中国自己的技术创新、产业升级。二是因为目前国内工资快速上涨，传统让中国变成世界工厂很多密集型的加工产业，会出现向外转移的直接投资。这是一个对其他发展中国家来讲，让他们实现创造就业、增加出口、创造外汇，以及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窗口。很可能在未

来中国的这些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往发展中国家去转移时，会带来全世界一个新的工业化的浪潮。这是有利于世界发展，解决贫困问题的，当然也有利于中国的发展，这是互利双赢的。（搜狐网 2015 年 1 月 23 日）

发展对外投资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金融学院院长**丁志杰**：长期以来，我国外汇储备的积累主要是让与实际资源和实际资产的结果，并通过外汇储备的形式对外输出储蓄。随着金融全球化趋势的发展，传统对外开放模式越来越不适用，其中突出的问题是对外开放效益低。扭转对外开放效益低下的根本出路在于发展对外投资。第一，发掘外汇储备对对外投资的支持作用。可以采取委托代理制，通过国内的金融机构以委托贷款等方式将外汇储备用于支持对外投资。第二，积极推进对外直接投资项下人民币可兑换。推进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要基于对外资产负债结构优化，把放松企业、机构、个人对外投资作为未来一段时间可兑换改革的重点。第三，继续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助力对外投资。人民币国际化既有效降低我国对外汇储备的需求，释放更多的外汇用于对外投资；还可以基于人民币国际地位用货币和信用对外投资，降低对外投资的汇率风险。第四，培育金融机构成为对外投资的中坚力量。在金融全球化背景下，金融业的国际竞争力和参与程度是决定对外开放效益的重要因素。第五，扩大深化南南货币金融投资合作。新兴市场国家在全球不平衡复苏的背景下有着共同的目标和诉求，摆脱对发达国家的依赖、加强自身抗风险能力都建立在南南合作的基础之上。第六，创造性运用开发金融发展对外投资。我国战略性使用外汇储备，倡导成立金砖国家开发银行、亚洲基础设施开发银行和丝路基金，探索不同模式的跨国开发金融机构，都是有益的尝试。（《中国金融家》2014 年第 2 期）

大宗商品下跌带来三大机遇 兰格经济研究中心首席分析师**陈克新**：由于国内外经济增速回落、世界巨头扩产降价、美元升值预期“三座大山”依然存在，预计 2015 年大宗商品将继续探底。大宗商品价格下跌虽然是把“双刃剑”，但对中国而言确实利大于弊，由此产生中国经济三大机遇：一是低成本建设机遇。总体来看，未来中国存在着规模巨大的基础设施建设需求、环境保护建设需求和城市化建设需求。二是低成本商品储备机遇。趁其低价进行大规模资源储备，还在于大宗商品价格不会长久低迷，我们可以获取巨大未来升值效益。三是低成本兼并收购机遇。大宗商品价格暴跌，致使许多相关企业严重亏损，相继陷入困境，其资产权益价格低廉，有些可能会以实际资产价值的几分之一价格抛售。与此同时，中国外汇储备伴随美元一起升值，也相应提高了中国的资产购买能力。这也造就了中国进行全球资源权益兼并重组的极好机遇。（《中国证券报》2015 年 1 月 19 日）

应对全球货币变局要有定力 经济学博士**马光远**：最近全球主要货币的异动让人眼花缭乱。欧元区的“量化宽松”政策引发了全球主要经济体货币“竞相贬值”，而

面对全球通缩的压力，美联储加息预期也再次模糊起来。人民币汇率出现明显下跌，连续三个交易日即期汇率逼近 2% 的跌停值。这些变化对中国央行提出了极高要求。受全球主要央行的政策异动，人民币未来的走势出现波动或动荡会成为常态。对于中国央行而言，除了不断传递人民币稳定的强烈信号之外，更应该厘清央行货币政策的主要目标，避免在宏观经济稳定、股市、楼市以及汇率等问题上求全责备而导致应对失措，最终顾此失彼。建议央行：其一，在资本项目仍然管制和中国拥有巨大外汇储备的情况下，人民币出现暴跌行情是小概率事件，央行货币政策的选择不应该过度关注汇率的短期波动，应该将此视为人民币汇率市场化的机会；其二，在经济增速下滑，通缩压力极大的情况下，货币政策应该紧盯物价，放弃包括房价在内的目标，及时通过降准降息等常规货币政策工具，释放流动性，避免中国经济陷入通缩的风险。同时，也给美联储加息后中国货币政策提供应对空间；其三，货币政策既不能罔顾流动性紧张的现实而在货币政策上无所作为，又要避免再次出现过度刺激，历史证明，过度放水对于中国经济无异于饮鸩止渴，百害而无一利。（《经济参考》2015 年 2 月 2 日）

“唤醒”财政存量资金 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经济研究所所长**匡贤明**：近日，国办正式对外发布《关于进一步做好盘活财政存量资金工作的通知》，标志着盘活财政存量资金改革进入实质操作阶段。短期内中国还有投资拉动的必要，在地方财政本已债务高企之下，唤醒财政存量资金，是中国经济全面进入新常态的必要前提。首先，《通知》中述及的十项措施也提出了“编制三年滚动预算”，这是个比较大的改进。但从现实情况看，很多财政资金沉淀与预算编制有很大关系。中国各级政府人大会议召开，大都在 1 至 3 月，人大会议召开后，财政预算才能通过；但财政资金又需要支出。按照这种方法，已经批准的拨款大多不能在年初到账，结算时却都以历法年度为起讫，造成了财政资金沉淀等弊端。突出的例子是财政补贴。地方拿到中央或上级补贴资金往往已是下半年甚至年底，当年无法执行，而地方财政早已保障了支出，这就带来了巨额的财政资金沉淀。因此，应考虑调整财政年度，使预算与执行相一致。再者，这次改革提出清理整顿财政专户的举措，有助于改变财政支出事出多账的现状。在此基础上，还要加快提高财政资金支出、尤其是民生类支出的透明度。当前，因透明度缺乏，中国支出规模、支出进度、支出效率等无法得到有效控制。提高财政资金的透明度，可及时发现资金沉淀问题，提出动态的调整办法，及时消化沉淀的问题。还有，就是尽快实行全口径预算管理。当前中国财政分为公共财政预算、政府性基金预算、社会保障预算、国资经营预算和政府性债务计划等四大预算。不同预算之间资金不能随便转移。这次改革打破了政府性基金预算专款专用的限制，明确结转资金规模较大的纳入一般公共预算大盘子统筹使用。这是不小的进步，值得肯定。

但下一步，还须打通不同预算，把所有的政府收支都纳入预算的总盘子统筹安排使用，并接受全社会的审查和监督。以规范财政收支行为、提高资金使用绩效。（《新京报》2015年1月22日）

本资料所登言论不代表本编辑部观点, 仅供党政领导和决策部门参考

责任编辑：吴健涛

本期编辑：何楚龙

校对：何楚龙

地址：城站路 85 号孝感市图书馆

电话：2823087

编辑日期：2015 年 3 月 25 日